

转型期的 中国经济

林 凌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转型期的中国经济

林凌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林凌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10
ISBN 7-220-05173

I. 转... II. 林... III. 经济-研究-中国-文集
IV. F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1658 号

ZHUANXINGQIDEZHONGGUOJINGJI

转型期的中国经济

林 凌

责任编辑	唐正宇
封面设计	文小牛
技术设计	古 蓉
责任校对	伍登富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网 址	http://www.bookss.com E-mail: scmcbf@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6679239
印 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21.25
字 数	492 千
版 次	2000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7-220-05173-5/F·527
定 价	42.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序 言

本书是从作者近几年写的文章中选出一部分编辑而成的，书名取为《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内容包括“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布局和调整”、“国企改革攻坚”、“区域发展新路”、“西部大开发战略”、“两岸三地协作”、“中国与经济全球化”七个部分。作者所以把不同性质的七个问题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这个总题目来统帅，是想说明中国经济转型的广泛性、复杂性及其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

—

中国经济的转型，总体上说是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体制转型，即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二是经济结构转型，即由现在的农业工业国向现代工业化国家转变。后者是目标，前者是方法。预期的目标是，2010 年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本世纪 50 年代，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两个转型是交织在一起并在相互作用中进行的。同时它又经常受到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影响，对两个转型产生着促进和制约作用。20 世纪后 20 年，世界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主流，为中国两个转型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

长最快的国家，并以惊人的速度走出了长达 40 年的短缺经济困境。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国内发生的动荡，90 年代后期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两个转型产生了重大的冲击。由于应对有方、有力，未发生大的波折，到 1999 年 GDP 仍保持了 7.1% 的增幅。但连续 7 年的下滑，又使国民经济陷入通货紧缩之中。2000 年中国即将加入 WTO，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西部大开发开始启动，全球经济增长加速，以国民经济信息化为代表的全球高科技迅猛推进，又为中国的两个转型提出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上如何与中国更加开放、更加介入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新格局相适应，如何走出通货紧缩困境，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是中国在近期若干年内面临的基本课题。

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在经济体制转型上明确地走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路。金融、税收、财政、外汇等体制的改革及多种法规的建立，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转型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打破了久拖不决的僵局，把体制转型推向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和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的攻坚阶段。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兼并、破产、股份制改造、债转股、股票上市、国有资本在某些领域的退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职工下岗再就业等产权制度改革成为体制转型的主旋律。与此同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先后出台。这些改革举措，都是必须要进行的。但由于经济增长率连年下降，职工下岗人数骤然增多，农民和职工收入增长缓慢，社会保障制度等尚未形成定型的全国性的规章，致使职工陷入收入预期下降、支出预期上升的矛盾状态，体制转型

的困难增大、支持力度减弱，社会问题凸显。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投资审批权、债转股审批权、呆坏账核销权、上市审批权、贴息贷款审批权等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手中，形成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跑部（步）钱（前）进的高潮，出现计划经济体制复归的现象，形成了新的权钱交易的腐败管道。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和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在宣布土地承包制 30 年不变之后，进一步得到巩固。但是迄今为止，农村经济仍然没有超出小农经济的范畴，土地分割细小的程度在当今世界绝无仅有，流转程度很低，基本上没有形成专业化、规模化经营。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公司加农户”、土地由公司向农户租赁、农户又向公司反包等多种土地规模经营模式。由于担心出现土地私有化倾向，不敢推广。农业与农产品加工处于分割状态，农民仍然是一个低价原料的供应者，得不到农产品加工附加值的收益。增产不增收的现象突出，农民收入增长率逐年下降，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实际脱贫与统计脱贫数有很大差距。现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土地制度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已大大减弱，制约农村经济增长的反作用日益明显。

以上情况说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如何从这些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中找到推动经济体制转型的新的思路和举措，防止改革的停滞，防止出现曲折和反复。

二

经济结构转型，是在长时间的经济短缺问题解决之后，全社会出现生产力（包括工业品和农产品）过剩时期

面临的另一个重大任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曾进行过一次重大的经济结构调整。主要以解决温饱和日用消费品短缺为目标，采取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政策，使过重的经济结构得到明显改善。其后，又大力进行了能源、原材料、交通、通讯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克服了经济运行中的瓶颈制约。与此同时，又在体制方面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改革国有企业，使供给大幅度提高。世界银行在1997年发表的《2020年的中国》的报告中赞誉说：“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这种评价并不为过。在解决温饱和短缺之后出现过剩，是人们所没有想到的。有些人把过剩归罪于重复建设，归罪于乡镇企业盲目发展。平心而论，没有各种力量一起上的重复建设、没有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温饱和短缺根本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为解决温饱和短缺必然会形成一个相应的而且相对稳定的经济结构。当人们的需求由温饱向小康转变时，已形成的结构不可能一下子转变过来，以满足温饱为主的生产力必然会出现过剩。现在中国的生产力过剩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低水平过剩，即12.5亿人刚刚解决了温饱而出现的过剩；二是过剩有三种情况，即绝对过剩、相对过剩和结构性过剩，而主要是相对过剩。总体上看，中国的经济结构基本上还是低水平、相对过剩型结构。

农民收入低下和购买力严重不足，是形成低水平、相对过剩经济结构的根本原因。过去20年，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来源于粮食的增产和粮价的提高，来源于养殖业收入和乡镇企业务工收入的增加，以及外出打工收入的节余，现在这四个方面的收入都在下降。据有关专家调查，1999年全国农民的收入水平只相当于城市1992年的水平，扣除数目相当大的再生产投入和各种名目的摊派，所

剩无几，购买工业品和服务的能力下降，广大农村的工业品市场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中国是一个商品消费层次差别很大的国家，在城市已经饱和的商品，在农村还会有九亿农民的庞大市场，如果能使农民的消费水平达到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一半，就可以把那些农民需要而又买不起的商品，在城市已经过了消费高潮期或者城市已经饱和的商品消化掉，而且还会有相当大的缺口。然而，目前农村几乎没有足以提高农民收入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加入 WTO 又会对农业带来严重的威胁。因此，如何围绕提高农民收入来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以开辟新的农村经济增长点；如何在不改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改革农村的土地使用制度，推进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塑造新的农村经济增长机制，是扭转整个经济下滑局面的关键环节。中国经济转型和快速增长发源于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20 年之后，面临下滑的中国经济将再次依靠新一轮的农业结构调整和体制转型，依靠农民收入提高的激励，而走上新的增长之路。这是我的一种判断，也是一个强烈的呼吁。

工业部门生产力的过剩，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落后，而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落后，又源于装备和技术的落后。因此，工业部门的结构调整主要应落脚在改造传统、发展高新、淘汰落后三个方面：即用现代技术大力改造传统产业；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坚决淘汰污染环境和浪费资源的落后产业。

中国的传统产业在工业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传统产业并非夕阳产业，而是由于传统产业的设备和技术落后，不能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导致传统产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一旦用先进技术进行改造，传统产业产品的技

术档次、技术水平、技术含量等就会大大提高，企业面目就会改观。因此，当前中国工业的首要任务，应当是以现代技术为手段，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为目的，来改造传统产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还存在许多问题。如以传统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复制古董”式的改造（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语），至今仍没有大的改变；“不改造等死，改造找死”，又是拨改贷后出现的新的难题；实行国债贷款和财政贴息政策后，又产生一种“不要白不要”的心理，争上改造项目，争要贴息贷款。而不论哪一种体制和政策，企业都不是技术改造的主体。这些问题，都必须认真加以解决，否则，传统产业的改造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特别应注意的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改造的主体；要以对市场的中长期预测为依据、先进技术为手段、产业升级为目的，决不能搞低水平、“复制古董式”的技术改造；要把中央高度集中审批项目的政策改为产业引导政策；要把单一的银行贷款政策改为技改资金多元化政策。

传统产业并不是都应改造和都能改造的，有些产业特别是那些绝对过剩的和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传统产业和企业，必须坚决淘汰。纺织工业是中国绝对过剩的产业，而且设备陈旧落后，压缩一部分过剩而落后的纱锭，是结构调整的必然选择。为解决经济短缺而做了重要贡献的“五小”工业企业（实际有十几小），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除少数改造升级外，多数都应退出历史舞台。近年来我国进行的压锭和关停“五小”的工作，为治理水污染而强制小纸厂停产，就是淘汰落后的重要举措。为了使淘汰落后顺利进行，要像对待纺织压锭那样，由政府给以财政援助和补偿。

中国已有不少资源开采型企业进入枯竭或将进入枯竭

期。关闭这些企业是客观规律，无法回避。但如何安置职工、恢复地面生态环境的问题必须相应解决。在发达国家，对这类问题已有一套解决办法。根据他们的经验，对资源开采型企业，从开采之日起，就要给资源确定价格，征收资源税，有偿使用；在资源开采成本中设立补偿基金项目，为以后的枯竭停产、安置职工提供补偿；对地面土地、植被、水源等环境破坏，制定谁开发谁复原的政策等。这些方面的法规和政策我们都是没有的，建议政府组织专门力量，调查研究，制定法规加以解决。目前实行的“关门走人”政策，是不适当的政策。解放初，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取了赎买政策，为什么对长期在资源开采业工作的职工就发一笔遣散费走人呢？建议仿照政府机关的精简政策，30年工龄以上加几级工资退休，年轻的重新安置工作。国家宁肯少搞一些建设，也要把这些职工安排好。

中国的高新技术，以“两弹一星”为代表，在60年代就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这些高技术长期用于军事，未向民用转移，更未形成产业。之后，电子信息技术在发达国家兴起，并逐步形成以国民经济信息化为主流的高新技术产业，电子信息技术在军事上的运用，进一步改变了军事战略和军事技术。目前，美国、欧洲已进入网络经济时代。与网络技术相关的工业部门在提高经济增长率和创造就业岗位方面表现突出，在所有经济部门中进行的企业重组几乎都与网络技术有关，电子商务增长势头十分强劲。现代战争实际上就是电子信息战争，所有武器几乎都是电子信息化武器。中国在这一领域总体上处于落后地位，近年来在追赶中有所前进，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在高新技术的其他领域，如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等，同样落在别国后面。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后来他又

说：“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过去也好，现在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党和政府制定和实施了“863 计划”，借鉴国外经验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开展高新技术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同时，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以后又建立技术创新体系，使我们在高新技术发展上取得不少成就。但“863 计划”，采取的是“跟踪”战略，而不是“追赶”战略，尤其在电子信息和网络技术上，没有像制造“两弹一星”那样，集中力量攻关，高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的进展很慢，不能不说是一个弱点。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印度造就出一个班加罗尔那样的国际性电子信息软件产业基地，预计今年印度软件产品的出口总额将达到 57 亿美元，占印度 GDP 的 1/4。我们建立了五十多个高新区，至今没有一个可以与班加罗尔相比拟，更不要说软件出口了，实在是一件憾事。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中国如不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电子信息产业，不能独立自主地进行开发，不能形成相当的规模，不能在传统产业上得到应用，中国的经济、军事、国际地位都会受到影响。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有三大重要依靠力量。一是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依靠这支力量，建立有技术创新能力、产品开发能力、体制和机制全新的高科技公司。近几年来我国发展起来的成都地奥、北大方正、清华同方、联想电脑、交大昂立、东大阿尔派、天大天财等都是这样的公司，其中的上市公司都受到股民的普遍青睐。这些公司都是构筑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基本支柱。我们应当培育

更多这样的公司出来。

二是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区是开发高技术、培育新产业的重要基地。区内既有国内国际比较成熟的高科技企业和中小高科技企业，又有孵化器式的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对培育和发展高技术产业有良好的条件和政策环境。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孵化的不仅是某种技术，主要是孵化一个高新技术企业；不仅使它的技术变成产品，而且要培育这个企业懂得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经营管理，并为它们办理注册、登记、开业、融资等手续，提供各种咨询服务，是培育民营高技术企业的好形式。我国的高新区数量多，资金、人才、项目高度分散，形不成拳头，浪费很大。应通过区与区之间的竞争和政府的引导，集中力量办好几个，使之成为我国的“硅谷”。

三是国防高科技研究机构和军工企业。这是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另一块重要阵地。它与民用科研机构和企业是在不同管理体制下运行的，但在改革开放以来，这些机构和企业实行了军民结合、以民养军的方针，大力开发民品，进入市场，取得很大成绩。著名的长虹电视、嘉陵摩托、长安汽车、西安飞机等就是从生产军品转而生产民品的成功典型。另有一批科研机构和企业，正在把军工高技术用于民品生产，显示出良好的前景。当前一个政策性问题是，要积极支持这些机构建立开发高科技民品的公司制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把产品推向市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时机成熟时，发行股票上市，不要与母公司混在一起吃“大锅饭”，使民品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尽快成长。封闭备用的军工生产线，要实行“国养军”的政策，由国家拨款养起来。这样的公司，也可以与非军工企业的多种资本合资，组成更有活力的资产多元的现代公司。

发展高新、改造传统、淘汰落后，是密切联系在一起

的，是一个推动技术不断进步、产业不断升级的动态过程，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在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一日千里的今天，更要赶上潮流，否则就要落后。我国在这三个方面都处于落后状态，历史欠账很多。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要集中力量，从这三个方面，把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

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不断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中进行的。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转型产生着巨大影响，中国加入 WTO 对中国经济转型将起加速作用。

（一）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直接面临的是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对中国的无情挑战。

地处亚洲的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四个国家和地区，面积小、人口少、资源短缺，经济很不发达，其中两个是由中国人、华人治理，一个中国人占主导地位，另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进入 60 年代后，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经济迅猛发展，仅 20 多年的时间，就成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70 年代末中国打开国门一看，首先进入眼帘的就是与“四小龙”的对比，在思想上、心理上引起强烈的震撼。为什么同是经济基础落后，又同是中国人、华人治理，而亚洲“四小龙”发展很快，我们却发展很缓慢呢？小平同志说，“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小平没有说，实际上指的是社会制度问题。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发展慢，人们就

会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与“四小龙”的直面比较，给我们带来挑战，也带来启示，同时也为我们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中国就是在这种比较态势下开始自己 20 年的超常发展的。这里还要强调的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和港、澳、台和全球华侨、华人、华裔有识之士一起，共同推进了两岸三地的经济协作，共同提倡建立“中华经济圈”或称“海峡两岸经济区”。这类组织虽然没有形成，但人们都已默认了它的存在。我认为，在当今时代，研究中国经济要从研究中国版图内的经济出发，为此提出“三个板块”、“四股力量”的观点。“三个板块”指的是三个发展水平不同的区域，即港澳台板块、东部沿海板块、内陆板块；“四股力量”指的是四种资本力量，即港澳台资本力量、沿海资本力量、沿边资本力量、内陆资本力量。这种格局是历史和不平衡发展规律造成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三个板块有很强的互补性，四种资本力量则具有互相吸引、渗透、磨合、聚集的功能，从而形成强大的合力。这种格局是中国特有的，对两岸三地的发展都是最重要的因素。改革开放后，中国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引进，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的内移，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导入，都是从港澳台开始的，对中国经济转型起了启动机的作用。港、澳的繁荣、稳定和顺利回归祖国，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支持是最重要的外部条件。与台湾的政治统一尚需时日，但经济关系已很密切。

90 年代中期以来，台湾对外贸易的盈余一直是由大陆提供的，没有台湾对大陆贸易的巨额顺差，台湾对外贸易将陷入庞大的逆差境地。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台湾是受损最小的地区，除台湾的金融体制比较健全、应对比较有力外，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台湾是一个很大的支

持。现在港、澳都已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但仍然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而且是独立的 WTO 的成员；台湾与祖国实现统一后，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仍然维持现行制度不变。继中国加入 WTO 之后，台湾地区也将进入这个组织。一个国家在一个国际经济组织内拥有四个席位，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两岸四地按照国际惯例在一个版图内进行经济交往，实现合理分工和专业化协作，必将对整个中国经济产生巨大的推动，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必然会显著提高。我们应为此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发展外贸，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强大推动力。

在对外开放战略上，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还是借用外债，是国际上有争论的不同的政策取向。中国采取了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政策。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带来资金，同时带来先进技术、装备、管理、人才和国际市场，而后者对中国来说，更为重要。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国际产业结构正处在大调整之中，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根据产业升级的需要，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形成国际间新的垂直分工。珠江三角洲是最早接受这种转移的地区，仅在 80 年代初期，就有八万家港资劳动密集型企业，以“三来一补”的形式迁入珠江三角洲的广大农村和城市。其后，台湾、韩国的同类企业也进入沿海地区。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的都是国际市场需要而中国市场还没有的新型日用工业消费品。转移到珠江三角洲后，不仅使那里的工业化水平和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引起了工业结构的迅速提升，居民收入的大幅提高，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的形成，城市化水平也提高很快，有力地促进了

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的经济转型。之后，日、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投资者相继进入中国，数十万个三资企业在中国建立起来，近百家著名跨国公司在华落户，进出口贸易由世界第 32 位上升到第 10 位，使中国的经济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在所有制结构上，个体、私营经济，乡镇经济，外商合资、合作、独资经济等经济成分大幅上升；在经济结构上，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提高很快；在国内外贸易上，对外依存度连连上升，在 GDP 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些变化又使中国的经济转型进程进一步加快。

（三）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中国的经济转型带来挑战，也带来新的机遇。

二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发生过多多次大小不同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但因中国实行的是对外封闭的体制和政策，这些危机都未对中国经济产生多大的不利影响。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在我国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发生的，开始阶段我们并未认识到它的危害性，仅认为是一次与我们关系不大的风波。后来危机越演越烈，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出口贸易、引进外资、人民币值的稳定、国内金融风险的化解，才警觉起来，采取对策措施。所幸国家在 1994 年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整顿金融秩序的措施，实行了汇率并轨，没有开放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上的自由兑换，同时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又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密切合作，支援了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一次又一次地承担了人民币不贬值的国际责任，因此避免了大的波动，在国际上赢得较好的声誉。这次金融危机使中国第一次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影响，对中国国内的金融风险和高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提出了挑战，对人们认识经济转型的外部条件和对应策略、措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是无法回避和阻挡的。中国经济要更快更好地发展，必须顺应这个潮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的分工和合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中发挥积极作用。但也必须看到，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是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金融机构都是操纵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手中的。因此，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活动中必须两面作战，既要积极参与，又要坚定地保护自己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经济转型上，也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考虑自己的承受能力，把握转型的时机，选择较好的策略，防止发生大的失误。

（四）加入 WTO 对中国经济转型带来强大的外部动力，也带来承受难度很大的压力。过去 20 年，中国的经济转型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都得益于对外开放多方面推动，但这些推动都是自然的而不是强制的；中国加入 WTO 后，必须按照 WTO 的规则和同各国的协议，实行一系列的商品和服务的准入政策，对外国企业和商品实行国民待遇。这样，就使中国与外国商品和服务的竞争变成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的竞争。这种强制性的格局，迫使中国企业必须进一步进行体制的改革、产业和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否则，就会在竞争中败下阵来。我们要珍惜这个机遇，在同外国企业和商品、服务的竞争中，把中国的经济转型大大向前推进一步。在强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下，有些企业要倒闭，有些产品要淘汰，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应该有一种高瞻远瞩的眼光，用一时的、局部的失利，换取长期的、全局的胜利。

作 者

2000 年 3 月